第 62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2, No.2
2025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25

历史的起点:《史记》中的时间设置及其意义

徐 建 委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史记》里的宏观时间结构主要表现在三个秦朝以前的年表中。在年表里,司马迁将西周的历史以共和元年为界裁为两截:一截入《三代世表》,未予编年;一截入《十二诸侯年表》,开始纪年,并与汉元年建立了岁岁相接的年代关联。共和元年是他刻意选择的“历史起点”。这一年之前是周衰前的“古代史”,而之后则是周衰至汉兴的“近代史”。《史记》是以“汉兴”为题眼,以“近代史”为主的历史。其时间设置因此具有指示周汉相继的象征意义。《史记》中的象征性理解历史的方式源自《左传》,从《左传》历史的起点和终点的叙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事件的指示意义。清华简《系年》的出现说明此种类型的历史写作出现于公元前 400 年前后。与《春秋》和《左传》相比,《史记》赋予了时间以独特的叙事功能,让时间具有了展现历史演变的意义。

关键词: 史记;历史的起止;象征性时间;共和元年
中图分类号:K 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2-0117-11

《史记》①将长时段、大空间内的人和事笼括起来,形成一种相对全面的对过去的理解和叙述。司马氏父子的撰述,有自己的取材标准,即《伯夷列传》所说的“考信于六艺”②。通览全书,以特定标准选录的古籍文献,是《史记》汉初以前历史的主要建筑材料。部分文献材料可以与传世文献或唐宋类书所存录的古文献相对勘。《史记》对古文献的转录是一种变相的文献收藏,很多重要的古书虽然散佚,但却因《史记》的裁取而间接流传了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难确定《史记》汉以前的历史哪些记载是转录,哪些记载是自撰。于是,利用其具体文句、篇章来理解或辨析司马氏父子的观念和思想,在学术上就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史记》的整体架构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同的设想,但它属于司马氏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不必纠缠于其文本中的细枝末节,而是登上山顶,俯瞰其山势走向,近观其写作的布局结构,远观其写作方式的观念渊源。司马氏父子的表层叙事之下,还赋予时间和事件以象征意义,体现了他们对历史变迁的结构性理解。这种将回溯过去变成理解历史内在发展的写作方式,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大方向。特别是《史记》纪年起点和终点的选择,别具深意。《史记》以共和元年和太初元年为起止确立了以年纪事的边界,司马氏父子据此划定了以周汉相继为基本轮廓的主体结构。本文尝试从写作的视角来理解《史记》的叙事,追溯《史记》这种书写和理解历史的方式的起源,并特别关注时间在《史记》叙事中的功能和意义。

一、《史记》中的宏观时间框架

《史记》虽然以《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前后相次,作为其历史大厦的柱石,但《史记》里的宏观时间结构却并不以王朝更迭为界。太史公的历史分期主要体现

收稿日期:2024-05-01
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史记》是汉末以后才有的书名,《汉书·艺文志》著录作《太史公》,一般被称作《太史公书》,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一律使用《史记》这一后起通行的书名。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121 页。

在三个秦朝以前的表中,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其中《三代世表》没有纪年,是按照世系来编的表。《十二诸侯年表》则有了详细的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前 841),止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前 477),是一个 365 年的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序》称此表"自共和讫孔子"①。《六国年表》始于周元王元年(前 476),结束于秦二世三年(前 207),共 270 年。公元前 206 年即汉之元年。通过年表的时间分割,司马迁将汉代以前的历史分作三个主要时段:

(一) 黄帝至共和元年;

(二) 共和元年至周敬王四十三年;

(三) 周元王元年至秦二世三年。

在这个历史分期里,周之后是汉,秦朝的历史编入了《六国年表》,并没有在《史记》的宏观时间框架里获得独立的位置。在时间上最具意义的是共和元年,这是《史记》以年纪事的起点,此前的历史司马迁本可赋予编年,因为不论从世系书,还是从谱牒、历书等文献中,司马迁都可将纪年上溯至周初或更早。如在《周本纪》里,武王时代有时间记录,但成王至穆王时代则主要使用了《尚书》类文献,没有用世系、谍谱类文献。穆王至厉王三十四年,《周本纪》采用了类似于《国语》的文献。厉王三十七年,便是共和元年了。这种时间设置与《十二诸侯年表》相似。其原因除了文献材料的限制和其考信于六艺的取材标准外,还应该有写作的深意在。毕竟《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至鲁隐公元年的一百多年几乎是空白的表格,各国的纪年材料也非常稀缺,共和元年之后的一百多年和共和元年之前的一百多年,文献材料的稀缺没有明显的区别。为何司马迁偏偏选择了共和元年呢? 且对司马迁来说,可信的纪年并非始于共和元年。"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然"周以来乃颇可著"②,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云云,说明至少周厉王之前是有清晰的年历的。如《鲁周公世家》伯禽之后每一位鲁公都有在位年数,据此很容易将伯禽卒年推定在公元前 998 年③。除了鲁国之外,依据诸本纪和世家中的记载,周和各诸侯国自共和元年可以上溯的时间分别是:周 37 年,秦 16 年,曹 23 年,陈 12 年,卫 25 年,宋 17 年,晋 17 年,楚 6 年,即秦、曹、陈、卫、宋、晋、楚等国均标出了与共和元年相对应的本国纪年,这或是他说"周以来乃颇可著"的原因。在年表里,他将西周的历史以共和元年为界,分为两截,上截纳入《三代世表》,下截则入《十二诸侯年表》。不仅《三代世表》中的周代历史没有纪年,《周本纪》中周厉王之前的王,除了周穆王,其他周王都没有清晰的在位年数。

年表里的共和元年是周室衰落,诸侯兴起的起点④。因秦未被纳入其王朝更迭的大结构中,周衰之后的王朝时代便是汉了,共和元年也是汉兴的遥远起点。故《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的起点是周之衰,而终点则是汉之兴。这两个表是有年可纪的历史,可以一年年地回溯,发现"汉兴"前史。

《史记》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时间基点是太初元年,这一年的意义和共和元年非常相似,也代表了一个大的时间分界,是《史记》中"历史"的终点。《太史公自序》说太初元年"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

---

①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第 511 页。年表终点之前的两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前 479)孔子卒,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太史表次,抑有条理。起自共和,终于孔子。"(司马迁:《史记》卷十四,第 683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第 487 页。

③ 司马迁在《三代世表》起首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司马迁:《史记》卷十三,第 487 页)这一段文字与《太史公自序》里起于尧,终于获麟的模拟五经起止的叙述很像,也是以《尚书》和《春秋》来对比。《春秋》有年月,故《十二诸侯年表》也有年月。《尚书》无年月,故《三代世表》亦无年月。接下来,太史公又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司马迁:《史记》卷十三,第 488 页)说明司马迁时代,黄帝以来的详细年谱是存在的,只不过各种历谱之间差异颇大,所以司马迁还是采用了孔子的取信原则,没有给《三代世表》以年月。

④ 徐建委:《〈史记〉春秋历史的写作实践与文本结构》,《文学遗产》2020 年第 1 期,第 28—43 页。

纪”,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注释“诸神受纪”一句为:“告于百神,与天下更始,著纪于是。”①可以说,太初元年对于汉武帝时代的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因此,它不仅是《史记》叙事的终点,也定义了《史记》的性质:《史记》叙述的是旧时代的历史。

故《史记》里的时间已经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线索,而成为《史记》呈现其意义的工具之一。共和元年和太初元年是《史记》时间结构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如果仅将其视作普通的一年,恐怕就无法整体上理解《史记》所蕴藏的意义。事实上,读者确实很容易忽视这两个年份在《史记》叙事,特别是其时间架构中的价值。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感知和司马迁时代并不完全一样。今人已经被公元年代框架所训化,习惯地默认公元年代是自然存在的时间刻度。丹尼斯·费尼(Denis Feeney) 在《凯撒的日历: 古代的时间和历史的起点》一书中,就特别讨论了公元纪年对当代人的潜在影响:“我们纪年系统的便捷和看似自然的特性,使我们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它所产生的所有日期本身最终都是同步的。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以公元前、后为时间轴来构建连贯历史年表的工作,已经被我们所有人彻底吸收并自然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视之为理所当然,而忘记了我们的前辈们自文艺复兴以来做了多少同步工作,才能让我们能够说出‘薛西斯于公元前 480 年入侵希腊’这样的话。这一驯化工程在便利性和可转移性方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但这也是古代研究者应该经常进行的一项陌生化工作,因为当用看似科学的统一编排——儒略历和公元前、后纪年系统——来掩盖不一致的古代数据时,我们所失去的历史知识与我们所获得的便利性一样多。”②公元纪年是我们现在用以理解历史的时间轴。欧洲大约在 16 世纪中期开始逐渐使用这种纪年方式③,而我国则更晚,要到新中国的建立,至今不过七十多年。④ 然而,公元纪年已几乎成为我们潜在的、无意识的,甚至是绝对化历史时间认知方式。⑤ 中国学者面对的年代问题和费尼所讨论的希腊、罗马年代问题并不完全一样,但我们却共同处于公元年代的时间意识之中。如果我们也像费尼一样,将《春秋》《左传》《史记》,乃至《诗经》《尚书》《国语》中的时间重新陌生化,摆脱对公元纪年的依赖,或许会发现那些古代文献中被隐没的意义。

国人暴动,厉王出奔,被《史记》认为是周王朝国运的转折,自此之后周王朝不可逆转地进入了衰落的过程。因其重大的转折意义,共和元年成为叙事的标记点。我们之所以要把古代的纪年,如汉武帝建元元年括注出公元年代,就是为了将这一古代的时间转化为现在的时间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标识古代不同事件之间的年代关系,以及这些事件和今天的距离。共和元年的功能和公元元年很相似,它至少是汉代的读者判断一个年代具体位置的锚点。只有将想象和描述依附于某个标志性的事件,时间序列才可能展开。马克·吐温(Mark Twain) 借用南北战争在美国南方人回忆中的功能,巧妙地说明了锚点事件对于构建时间序列的价值:“战争就像其他地方的公元一样: 他们都是从战争开始的。你整天都能听到有人把事情‘说’成……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 或者是在战争之前发生的; 或者是在战争之后发生的; 或者是在战争之前或之后大约两年、五年或十年发生的。”⑥其实这种类似于南北战争的时间标志事件我们也常用,比如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等等。在《史记》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锚点事件,比如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第 3296 页。

② Denis Feeney, *Caesar's Calendar: Ancient Time and the Beginnings of Hi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12.

③ 西方世界最早以连续性的、累积的时间刻度代替新王即位改元的更始纪年方式,是在塞琉古帝国,参见 Paul J. Kosmin, *Time and Its Adversaries in the Seleucid Emp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格里历虽然在 16 世纪中期被制定出来,但英国直到 1752 年、瑞典直到 1753 年才开始使用。

④ 完全使用公元前、公元后体系纪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⑤ Pamela-Jane. Shaw, *Discrepancies in Olympiad Dating and Chronological Problems of Archaic Peloponnesian histor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3, p.29.

⑥ Denis Feeney, *Caesar's Calendar*, p.13.

齐桓公葵丘之会,晋楚城濮之战,孔子相鲁等,它们在《史记》中都有校准时间的作用,但唯有共和元年具有建立时间标尺的功能。这个年份是《史记》构造的前汉代史的起点,也是《史记》时间轴的起点,这一年之后的历史都可以被纳入一个以王朝年代为中心的时间序列,不同诸侯国间参差的年代也得到了一个参照系。

二、《史记》时间设置的象征性

理解《史记》中时间的叙事意义,还需从《史记》写作构想及其起止的改动来切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借与壶遂辩论,详细解释了他们父子的著作理想。他引述了父亲司马谈的话:“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①司马谈的理想是续写《春秋》,这才引来壶遂的问难②。汉武帝时期,制度和礼仪的更新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和期待③,很多读书人也希望能够出现与汉王朝相匹配的新经典。在汉代人的认识里,孔子以来推崇的六艺是周的经典,汉代亦应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与六艺合为七艺。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里就有“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④的说法。司马相如所说的《春秋》,指的是新《春秋》。司马氏父子所谓的“继《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写一部经传并行的、综合六艺体系的新《春秋》。这与司马相如的期待是一样的。司马谈临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⑤为新时代著史之意更是十分清晰明白。这是著汉典以效周典,是有象征性的。

与模拟《春秋》相关,《史记》起止年代的变化也体现出了其时间设定的象征意义。这个问题源自《太史公自序》里的矛盾:

1.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2.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我们在《太史公自序》里看到了两个《史记》历史的开始和结束。一个是从尧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即所谓“麟止”,前 122),一个是从黄帝到太初元年(前 104)。吕思勉在其读史札记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判断《史记》原本的本纪开始于尧,而非黄帝。黄帝、颛顼、帝喾的传记乃是后人根据《五帝德》补入⑥。尧至麟止、黄帝至太初两种起止都与汉武帝时代的象征性大事有关,由此顾颉刚认为这两个起止并非后人缀补,而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先后持有的不同写作计划⑦,元狩元年十月(公元前 123 年年末)获白麟,汉武帝命作《白麟之歌》,这时司马谈是太史公。《史记》起于尧,终于获麟的写作计划,应该是他拟定的。从尧到“麟止”,是一个整体上模仿《五经》的起止计划,这正与其写作构想一致。《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中所记录的历史中,尧舜时代是最早的,见于《尚书·尧典》,而最晚的记录则是《春秋》中的“西狩获麟”。麟是太平时代的符瑞,是西汉时代的常识,《公羊传》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⑧《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第 3296 页。

② 刘知几《史通》曰:“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 页)

③ 《史记·封禅书》:“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第 1384 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第 3068 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第 3295 页。

⑥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8 页。

⑦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230 页。

⑧ 陈立:《公羊义疏》,刘尚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2884—2887 页。

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①,这里所说的符瑞,无疑就是元狩元年所获的“白麟”。《史记·封禅书》载元朔六年(前 123):“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②故知汉武帝元朔六年,捕获一头白鹿,以为瑞应。元狩元年又猎得一头一角兽,不是白色。有司附会为麟,武帝顺水推舟昭示天下,暗示上帝赐麟,可见最初所谓获麟,并不是白麟。汉王朝随后将先后两次猎获的白鹿和一角兽合并命名为“白麟”,当然是要和《春秋》的记载联系起来,向天下宣布太平时代和真正王者的到来。这件事不仅是《史记》最初计划中的终点,也是触发司马谈产生著书想法的起点。受到王朝和天子如此重视的白麟,以及官方命名上的有意附会,或许给了司马谈灵感,让他开始意识到要写一部新的《春秋》。将“麟止”作为《史记》的终点,正是“继《春秋》”的最佳方式。

司马迁元封三年开始续写后不久,西汉王朝就迎来了另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太初改历。历法是上古时代人们统合时间、空间以及人类社会各种礼仪、制度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沟通天人的工具。历法的改变意味着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制度礼仪都要发生变化,因此,太初元年的改历,是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时刻。而且司马迁也是太初改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汉武帝元封七年的冬至日,与时间循环相关的天文标记和历表都回到了历法意义上的原点,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正好是黄帝时代历日的回归。③这是更新历法的最佳时机。太初元年历法的更新,意味着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和新的历史的开始。太初即为宏大的开端,“一种全新统一的世界秩序自此开幕,同时这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太初’宇宙的新生”④。在太初元年之后的司马迁,很自然的会将记录过去的终点选在太初元年。这样一来,他就改变了父亲的写作计划,作为起点的尧的时代就与作为终点的太初元年不相匹配了。司马迁需要确定新的起点。太初改历要复现的黄帝时代,自然成了他的选择。⑤ 至此,《史记》写作的起止年代得以确定。

故《史记》和《春秋》《左传》不一样,它里面的时间起点不是自然的起点,而是人为的起点。共和元年以后的时间有计数的功能,从这个点开始,时间按照以年为单位的刻度,一格格地走到了汉武帝时代。所以能够与汉武帝时代建立年代联系的是共和元年,而非黄帝时代。共和元年不仅是王道衰微,诸侯力政的开始,也是汉之兴的计数时间的起点,是一个推动叙事进程的能动的时间。

这种推动历史叙事的时间性表述,在《周本纪》里表现为对王朝的“周衰”的反复提示⑥。“幽厉之后”几乎成为了《史记》早期历史讲述的惯用语。在一部分“太史公曰”或序言之中,司马迁(或司马谈)也会明确勾勒出其主线,“周衰”至“汉兴”就是一种最常见的修辞和叙事逻辑。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史

---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第 3299 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第 1387 页。

③ 据郭津嵩《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历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89—108 页),汉武帝改历的动机开始于元鼎四年(前 113),应该是在公孙卿的鼓吹下,意图重现黄帝时代的时间体系,是一种结构上的时间更新。这一改历更多的像是回归,而不是建立黄帝时代与武帝时代的线性时间联系。改历具体记载参见《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研究论著还可参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第四章《太初历和三统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0—301 页。宫本彻:《太初改历及其背景》,《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 年第 4 期,第 84—86 页。郭津嵩:《太初改历始末考》,《北大史学》第 25 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8—29 页。

④ 川胜义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李天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9 页。

⑤ 郭津嵩:《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历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89—108 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四,第 134—149 页。

记》的叙事里,周汉相继是其大框架,黄帝乃至殷商的历史,并不是其重心所在,起到的是入话或楔子的功能①。黄帝时代虽是《史记》客观意义的时间起点,但更像一个静止的历史背景。通览《史记》,会发现黄帝只在三篇文献里占有重要的位置:《五帝本纪》《历书》和《封禅书》。夏、商、周、秦、楚等虽在世系上均可上溯至黄帝,但《史记》诸本纪及世家的世系,却并不以黄帝为起点,而是将帝喾或颛顼作为诸民族的先祖。《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临终叙述写作缘起,以周公、孔子为先贤,取法于周的观念是很明显的。《史记》重心是仿效周公、孔子,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著史文。在司马氏父子看来,周公所述为周王朝奠基时代的文武之德,孔子则面对幽厉以来的世道衰微而修旧起废,他们分别对应着周兴和周衰。司马氏父子面对的是"汉兴,海内一统"的局面,故"汉兴"二字才是《史记》的题眼。

《史记》不论是止于元狩元年,还是太初元年,都是一座在汉武帝时代用文字筑成的纪念碑。它是一部在文本之下潜藏有象征意义的著作。其象征意义的设置,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时间的剪裁来实现的。

三、《史记》历史观念的渊源

《史记》时间设置的象征性,最早可以在《左传》和《国语》看到。《左传》最后以"悼之四年"(即鲁悼公四年,公元前 464 年)章结尾,内容是智伯伐郑,与赵襄子交恶之事。随后又记"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②,韩、魏与赵氏谋杀智伯,已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 454 年)。《国语》的叙事,正是结束于鲁悼公十四年智伯之亡。马王堆《春秋事语》也是结束于鲁悼公十四年智伯之亡③。《左传》《国语》和《春秋事语》的结尾都指向了智伯之亡。黄震《黄氏日抄》引苏辙、吕祖谦说云:"苏氏曰:自隐以来,诸侯始专,而五霸之形成。获麟之岁,田常弑简公专齐,后二十八年韩、赵、魏灭智伯分晋,而战国之形成。左氏传《春秋》止于智伯之亡。东莱吕氏云:《左传》终此,温公《通鉴》始此。《通鉴》继《左氏传》而作也。"④即智伯之亡是三家分晋的起点,预示着战国时代的来临。《资治通鉴》开始于智伯之亡,有相继之意。张溥对《左传》终智伯的解释也很值得参考:"一以示兴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晋阳之守,赵以仁兴。决水之祸,知以骄灭,此兴亡之戒也。晋分则秦强,秦强则周亡。此周、秦之端也。"⑤智伯亡后,三家分晋,秦由此而逐渐强大,这是很有解释力的分析。

《左传》《国语》和《春秋事语》共享了一种历史认知,应该不是偶然的。清华简《系年》的出现,为我们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线索。《系年》是一篇完整的文献,由 23 章文字组成,各章大体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并相互独立,但明显有一条叙事的主线。李学勤有简洁的介绍:"《竹书纪年》的记事始于夏代(或说五帝),《系年》只起自周初。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在其前四章,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⑥李零也说"此书涉及国家很多,但不像《国语》那样分国叙事,而是有一条主线。它讲西周衰亡,是为了引出东周各大国

---

① 关于《史记》以黄帝为历史叙事或政治传统建构基础的研究,参看李霖:《从〈五帝本纪〉取裁看太史公之述作》,《文史》2020 年第 1 辑,第 87—128 页;徐刚:《黄帝传说与〈史记〉的政治传统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第 128—140 页。

②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903 页。

③ Yuri Pines, "History as a Guide to the Netherworld: Rethinking the *Chunqiu shiyu*,"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1 (2003), pp. 101-126.

④ 黄震:《黄氏日抄》,王廷洽等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8—169 页。

⑤ 吴静安:《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续》,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02 页。

⑥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 年第 3 期,第 70—74 页。

的崛起”。①即《系年》中,讲述西周历史,特别是其衰亡的历史,是为了理解东周大国的崛起。这是一种寻因的历史观,和《左传》惊人地相似。《左传》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公元前 350 年之前,与《系年》的抄写年代非常接近。二者如此接近的历史认识,很难让人认为这仅是巧合。

与《左传》《国语》《春秋事语》结束于智伯之亡不同,《系年》记事结束于楚悼王五年(前 397)。《系年》第二十三章出现了楚悼王的谥号,多数学者判断《系年》书于竹简的时间在公元前 381 年之后。但这应该是《系年》抄写的年代,而非文本写作的年代。今日所见楚简《系年》,应该是文本写成后,又在公元前 381 年以后被抄写复制的一个文本。原因除了其记事止于公元前 397 年外,还和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章提到的六位没有谥号的国君有关。尤锐(Yuri Pines)对此已有考订:

> 我们可以确认《系年》的编纂是公元前 381 年以后的事情,因为《系年》第 23 章第 127 简记载了楚悼哲王/悼王是在公元前 381 年。章 22—23 所提的六国国君在位年代如下:晋公止是晋烈公(约前 415—前 389 年在位);齐侯贷是齐康公(约前 404—前 391 年在位,去世于前 379 年);鲁侯显是鲁穆公(约前 410—前 377 年在位);卫侯虔是卫慎公(约前 414—前 383 年在位);宋公田是宋休公(约前 403-前 385 年在位);郑伯骀是郑繻公(约前 422—前 396 年在位)。……其中四位国君比楚悼王去世得早,《系年》编纂者肯定知道他们的谥号。而不知道这些国君谥号的人应该是公元前 4 世纪初的楚国的史官。②

尤锐已经判断出《系年》的写作在公元前 4 世纪初。我们还可以根据国君的在位年推断出这一章具体的写作年代区间。国君即位之前不可能被称为某公、某侯,下葬后则有谥号。所以最晚即位者和最早离世者之间的时间,就应该是《系年》文本写成的年代。上述《系年》所记无谥号的国君中,最晚即位者为宋休公,最早离世者为郑繻公。故《系年》的出现,应该在宋休公即位之后,郑繻公离世之前,即公元前 403 年至公元前 396 年之间。因其记事正好结束于公元前 397 年,所以可判断《系年》的文本完成于公元前 397 或公元前 396 年。

《左传》和《国语》的主体部分,大约也完成于公元前 4 世纪上半叶,加之《系年》和《左传》《国语》在历史观念和记事上的一致性,说明这种关注周室衰落和诸侯兴起的历史认识和写作,出现于公元前 400 年前后。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公元前 403 年周威烈王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此前强盛了三百年的晋迅速让位于三家。从《左传》《国语》《春秋事语》和《系年》所持有的解释方向和历史观念判断,理解三晋列为诸侯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动,是这类历史著作出现的主要动因之一。这时的新兴诸侯也需要建立自身历史的合法性,那么从周衰开始追述历史,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清华简《系年》叙事简略,但其理解历史的模式与《左传》非常一致,偶然性事件造成的历史发展方向的变化,是其着重记录的内容。很多学者认为《系年》接近于纪事本末体,正是这个原因。这也说明《左传》式的叙事模式并不是其首创,而是那个时代共有的一种理解方式。

可以说,公元前 400 年左右出现了一次历史写作与编纂的热潮,从西汉文献看,战国末年至西汉时代文献中的历史材料或历史故事,大多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③。不仅如此,那时的历史写作,还共享了同样的历史观念,并一直影响到了《史记》的写作。

四、《史记》年表的叙事功能

相比于《左传》《国语》或《系年》,以理解盛衰为追求的历史写作在《史记》里更加成熟,并赋予时间新的叙事功能。在处理历史上的时间时,《史记》写作遇到的最大困难应是协调和统一不同的记事和

---

① 李零:《读简笔记:清华简〈系年〉第一至四章》,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上海:中西书局 2016 年版,第 39 页。

② 尤锐:《从〈系年〉虚词的用法重审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系年〉原始资料的来源》,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上海:中西书局 2016 年版,第 248 页。

③ 徐建委:《文献考古:关于〈左传〉〈史记〉关系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58—63 页。

时间系统。这也很可能是司马迁没有采用共和元年之前纪年材料的原因之一,时代越早,各类纪时材料之间的协调难度就会越大。直到司马迁可以使用《春秋》和《左传》时,他对时间的协调才变得容易起来。

孔子编纂《春秋》,已经以鲁公的年世为轴,在协调诸侯间互异的纪年体系了,其做法是将诸侯之事放入鲁国的时间系统里,形成以鲁国纪年为框架的叙事体系,如刘知几《史通》所言,这种做法应该是《史记》本纪的源头。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受到丹尼斯·费尼的启发,在他为《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所写的第18章《历史学与帝国》中特别讨论了周秦时期编年史中的时间同步工作。并特别分析了《左传》《竹书纪年》和睡虎地《编年记》①。这几部著作的时间同步工作还仅限于线性的叙事,《史记》年表则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时间同步做法:将不同的时间线平面化和视觉化。共和元年以来,以周王年代为纲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协调和同步各国历史的功能尤为突出,让不同地区的事件统一到一个时间框架之内。《左传》中诸侯国之间的历法和时间计算并不相同,如何将不同时间线中的事件同步到一个时间序列里,对任何人来说都颇具挑战。周代主要以天子和诸侯在位年来纪年,但不论是周王朝还是各诸侯国时常会发生政变,并造成非正常的君位更迭,即位的新君一般会直接开始改元纪年,而通过正常途径即位的国君,大多会隔年改元。② 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历法也存在差异,在观象授时阶段,有的国家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有的则以正月;同一国家,如鲁国,前一年还是以十一月为岁首,下一年却有可能调整为十二月。所以不同诸侯国之间的年代对应会有很大参差,且没有规律可言。夏历十一月,在春秋时代的鲁国有时候已经是新的一年了,但晋国却还在旧年;而有的年份,鲁国有和晋国有共同的岁首和岁末。鲁国年初发生的事,对于晋国来说,有时是年末,有时又在年初③。当一件发生于夏历十月以后的事出现时,不同诸侯国史官的记录年代就很难协调。在《十二诸侯年表》和本纪、世家之间,以及年表中不同诸侯国之间,存在非常多的一年或两年的年代差,就是这一难题的反映。

战国以前,解决因地区差异造成的时间和事件的不同步的方法,是选择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锚点。《左传》中保存有这种同步各类事件的痕迹,如“会于沙随之岁”“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之岁”“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蔡侯般弑其君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等以同年重要事件为标尺的纪年方式,也有“杞桓公卒之月”“齐师还自燕之月”等以某月的发生的大事为锚点的方式。④ 出土的楚简里,以标志事件作为时间标尺记事颇为常见。⑤ 但是当遵循王公纪年传统的史书和标志事件纪年相遇时,年初/年末或隔年/不隔年等问题就会特别凸显出来。因此这种协调

---

① Mark Edward Lewis, Historiography and Empire,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1: *Beginnings to AD* 600, Ed. Axel Schneider, Daniel Wool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47-454.

② 戴震:《春秋改元即位考》,《戴震文集》卷第一,赵玉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22页。

③ 此为《春秋》学讨论颇多的问题,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于隐公元年传下之论,颇为通达,引之如下:“古之时,三正虽迭建于帝廷,亦并行于侯国,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晋封于夏故墟,民习于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晋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于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遂致参差不一。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輙之奔,经传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于景祥、柳海松整理,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④ 徐建委:《文献考古:关于〈左传〉〈史记〉关系的研究》,第139—141页。

⑤ 夏含夷:《纪年形式与史书之起源》,陈致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时间的图表并不好制作。考虑到这些,《史记》东周年表的制作更显得意义非凡。①

在汉武帝时代,存在多种类型的以时间为线索的文献,如世、谱和历等。世系一类的文献在战国秦汉间颇为流行。司马迁于《史记·三代世表序》说有《谍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有《春秋历》《谱牒》,足见年表的绘制主要依据历和牒两类文献。所谓"牒",即"谍",也就是"世"。《汉书·艺文志》有"《世本》十五篇",历谱十八家中也有"《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②,这里的"世"和《史记》中的"谍"或"牒"所指相同,乃是一种书于牍板的世系类文献。《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讲教育太子时,有:"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③可见世载录先王世系,并兼有警示和劝诫的功能。那么世应该有简短的大事记录。2002 年和 2004 年,湖北荆州印台 60 号汉墓和荆州松柏 1 号汉墓都出土了题为"葉书"的文献,李零、陈伟、陈侃理等学者皆有研究。松柏 1 号汉墓的"葉书"以在位年为主,但也在"吕太后八年死"之后,记"其七年,发卒击南越尉它; 八年死,赐户爵各一级"。陈伟、陈侃理均判断"世"之书,即"葉书",也即"牒书",最初写于牍板(即牒)上。④

不论是松柏 1 号汉墓的"葉书",还是秦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种大事记,都是单线的记录,并没有《史记》年表的那种复线的网格布局。复线布局的世系,应该是谱。《史记索隐》引刘杳说曰:"《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放《周谱》,谱起周代。"⑤《周谱》的旁行斜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式并不好判断,但大体就是《三代世表》的样式,已经是复线的世系了。但《三代世表》本质上是一种树状图谱,是基于宗族血缘世系的系统,并非以年为刻度的表格式时间图谱。

表格式时间图谱很可能是司马迁融合历表和世系书为一的创造。这种类型的年表具备了历史叙事的功能。《太史公自序》说:"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 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⑥就有综合《春秋》和谱、牒的意思。东周的两个年表相当于将东周史平面化和视觉化,并为这个阶段的历史建立了一个时间刻度或坐标轴,将原本相对的时间,变成了绝对的时间。整体看,这些年表是网状的,每一格记事都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因果的关联性。年表让时间变得可视,不同诸侯国的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关系也清晰可见。即每一格记事的意义是由整个时空之网赋予的,它同时又是这张网的一部分。年表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叙事能力,让时间在可视的空间中流动。用几何空间结构来记录历史时间和事件,让其变得更加可以理解。故不仅历史叙事的起止设定,《史记》的年表同样让时间获得了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功能。特别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几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叙事模式。

这一形式的历史与公元 4 世纪出现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编年史》极为相似,二者结构几乎

---

① 薛梦潇《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论及殷周至秦汉时代纪时体系的变化:"纪时法不仅是工具性的时间记录,也是'政治时间'的表达。殷商以'祀'表示一年的周期,是'政治时间'符号的早期运用。两周铭文'唯王某年'与'王某月'的书写在形式上表现出对周王时间秩序的奉行; 相反,标明'都正',以及战国铜器上大量的诸侯纪年,则是对地域、国别时间的强调。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九州幅裂演进为天下一家。这一历史进程也投射到纪时法上。帝制国家机器的运转,须以时间统一为必要前提。在兼并战争中获胜的秦人遂将本国的时间制度向天下推行,以'帝国时间'取代'战国时间'。面对王国自行纪年、不奉汉法的现状,皇帝对权威辐射力的更高追求,唤醒了利用'时间'塑造一元政统的自觉。武帝的太初改历与纪时法更新背后,是王朝'正朔'观念的确立,以及皇帝对'大一统'的体认。"(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6—247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三十,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66 页。

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85 页。

④ 陈侃理:《"葉书"与"谍记"》,田炜主编:《文字·文献·文明》,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5 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第 501 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第 3303 页。

是一样的，只不过《十二诸侯年表》的时间序列是自右往左，而《编年史》的则是自上而下。这与二者所使用的抄写材料和书籍的形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史记》的年表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刘知几《史通·表历》篇甚至认为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年表，其他类型的年表都无必要，《史记》列表"成其烦费"，"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并不会看表。他甚至批评《汉书》《东观汉记》在体例上完全没有必要列年表①。但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出现以后，却特别受欢迎，"尤西比乌斯年表的近代版本，跻身于最早的印刷书籍之列；在任何一位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学者的藏书中，《编年史》也是最重要的必备参考书之一"②。中国史书中年表受到冷落，可能与纪传的发达有关。刘知几的批评从另一角度看，是《史记》所建立的年代框架已经被后世的文人完全接受，甚至成为默认的古代历史结构。而最初建构这个理解结构的年表，反而不那么必需了。

《史记》采用线性的时间架构，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武帝时代，这一选择却具非凡价值。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时，正是汉武帝封禅泰山至太初改历期间。据郭津嵩的研究，此时汉武帝已经被公孙卿说服，采纳了循环式时间观念，将汉武帝时代视作黄帝时代的回归或复现③，这是一种颇具神圣性的时间观念，也有一定的宗教因素。在太初改历时，上元以来的年数是十分清晰的，即 4617 年，《史记》完全可以按照这一时间框架，画出一个循环式的年表。然而，《史记》没有将这种神圣性的循环时间纳入叙事系统，而是坚持使用战国以来六艺解释体系中的世俗时间观念，将周衰作为汉兴的起点。司马迁自述其取材标准是"考信于六艺"，六艺经典里，《尚书》《诗经》《春秋》乃至其传记，都是世俗的、线性的时间，即便是他写《五帝本纪》参阅的《五帝德》和《帝系》，也都是客观的线性的世系，与武帝信仰的循环式神圣时间观念并不兼容④。《史记》本拟六艺，采用六艺的时间模式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在将黄帝和太初设为起止之后，司马迁仍然没有将太初改历背后所存在的时间观念明确书写下来，显现了他的某种坚持。《史记》《汉书》之后，官方著述便以史书为主，《史》《汉》塑造了后世史书的书写模式，它们中的时间结构和观念也自然被延续了下来，线性的和世俗的时间成为传统中国最主要的时间感知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文化的品格。这也许是《史记》时间框架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从周衰到汉兴并不构成因果的链条，而是天下世界由混乱到统一和兴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神圣的力量推动的，也不是伟大过去的复现，而是文明的自然进程，是从一个盛世向另一个盛世的过渡，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推动的历史。这种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之于人的倾向，虽然源自《春秋》《左传》，却因本纪、世家、列传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史书体例而得以强化。这是司马迁对历史的理解，更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代的理解。周衰至汉兴的这段线性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太初元年以前旧时代的纪念碑，也是一座象征新旧时代更替的界碑。

结　语

公元前 403 年，赵、魏、韩三家列为诸侯，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已然瓦解，历史出现了大的变化。不论是诸侯还是士人，都需要理解这种历史的变化。《左传》《国语》类的史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集

---

①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 48—49 页。

② 丹尼尔·罗森伯格(Daniel Rosenberg)，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时间图谱：历史年表的历史》(*Cartographies of Time: A History of the Timeline*)，杨凌峰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版，第 20 页。

③ 郭津嵩：《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

④ 关于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的分析，参米尔恰·伊利亚德：《永恒回归的神话》，晏可佳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5—83、98—111 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1—33 页。

中编纂,《系年》是这一类史料最早被系统化的代表之一。他们理解历史的方式影响到了《史记》的写作。《史记》在叙事中,特别重视"周衰"这一起点,这一认识和《左传》《国语》相似,只不过《左》《国》是将周衰视作战国时代的缘起,而《史记》则是将其视作汉代历史的远源,并特别选择了共和元年作为周衰的起点。这是其"近代史"的开端;共和元年以前,则是其"古代史"。《史记》先秦历史的年代框架虽然参照了《尚书》和《春秋》,但却特别重视周厉王以来的"近代史",目的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推究汉兴的缘起。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古代史"非司马迁所重,它并不属于理解汉兴的主要环节,故《史记》中的古史主要以《诗》《书》中的材料为主,并不关心其是否具有清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至太初元年只有 738 年,在《史记》所囊括的时间序列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它构成了周衰至汉兴的完整过程。这种截断历谱,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做法,让时间也成为被剪裁的对象,不再是天然存在的外在历史框架,具有了构造历史过程和赋予事件以历史意义的价值,对后世的时间观念有奠基意义①。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Time Setting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Its Significance

Xu Jian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macro-temporal structure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史记》) wa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chronological tables predating the Qin Dynasty. In these tables, Sima Qian (司马迁) divided the history of the Zhou Dynasty into two parts with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Gongbohe (841 BCE, 共和元年) as the demarcation point. The first par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Dynasties*(《三代世表》) without chronological organization, while the second par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十二诸侯年表》), where systematic chronology was started and substantive chronological connection was mad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E, 汉元年). The period before this demarcation represented the "ancient history" prior to the decline of the Zhou Dynasty, while the period afterward constituted the "modern history" spanning from the fall of the Zhou Dynasty to the rise of the Han Dynasty.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as fundamentally a history centered on the "rise of Han", with its temporal framework symbolizing the succession from Zhou to Han. This symbolic approach to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as originated from *Zuozhuan*(《左传》). The narrative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history in *Zuozhuan* already revealed the indicative significance of its events. The *Series of Years*(《系年》) in the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demonstrates that such mod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emerged around 400 BCE. Compared with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春秋》) and *Zuozhu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endowed time with a unique narrative function, allowing it to signify historical evolution.

Key word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history; symbolic time;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Gongbohe (共伯和)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作为比较,保罗 J.科斯明发现了塞琉古帝国在西方世界时间观念方面的奠基性影响:"在希腊化时期,塞琉古帝国作为近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在时间持续性的理解上展现了强烈的创造力,它不仅是时间观念和历史经验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地点,更是这场变革的推动者。我认为,塞琉古帝国所确立的正式时间结构(尤其是纪年方式)以及那些与之呼应、反抗并最终颠覆这些结构的本土时间观念(特别是其末世论),在许多重要方面对当时的世界来说是新颖的,并且对我们的世界具有奠基性意义。"(Paul J. Kosmin, *Time And Its Adversaries In The Seleucid Emp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